

光明时评
中国新闻奖专栏

统一部署下,北京等多地开展了集中整治“号贩子”和“网络医托”专项行动。在各部门的联合努力下,各地各大医院号贩子猖獗横行的势头有所减弱,但远没有绝迹。在联合打击之下,一些号贩子“与时俱进”,摇身一变成为“网络号贩子”,搭乘科技的快车,不少号贩子在114等平台抢号、囤号,在网上兜售叫卖,有些网店月销量达7000单之多。

正是在此背景下,北京市卫计委日前联合公安部门,升级挂号平台,和驻院民警进行联动,将高度可疑的号贩子的卡号加入“黑名单”,严格落实挂号和实名就诊制度,积极探索挂号平台网络预约经费结算方式,统一网络号源开放时间,加大信息监管。同时,加强挂号平台和医疗机构内部管理,进一步做好技术防范和人力防范工作,压缩各种“号贩子”的生存空间。

近年来,由于互联网和个人支付大量介入个体生活,大数据开始和每个人息息相关。而身份证、医保卡等信息采集技术手段的更新换代,也使得大数据和每个人紧密相关。辽宁沈阳等地的智慧医保已经通过APP开通人脸识别功能,使用者足不出户就可以线上使用医保卡中的部分功能。

利用大数据和平台共建数据共享,一方面方便患者对医疗资源的使用,改善就医体验;另一方面,在打击号贩子,打击医疗作假和套保骗保等方面,大数据也将大有可为,从线上和线下全面压缩其生存空间。

科技手段的运用,可以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人脸识别系统、网上身份证防伪技术等众多互联网科技新技术已广泛应用于电商和生活各个环节。但是这些先进的技术、强大的系统、庞大的数据,常常掌握在专业机构或者少数部门手里。

如果在整治“号贩子”和“网络医托”等社会顽疾的过程中,能够借助大数据和高科技的巨大作用,那么百姓将能享受到更加公平、高效和完善的医疗服务,而这也是科技进步带给全社会的福祉之一。

GDP 落实到民生才能沥干水分

□ 魏河朔

据媒体近日报道,中国“万亿俱乐部”即GDP达万亿元人民币的地方,又增添了江苏无锡和湖南长沙。2017年,这两个城市的GDP分别为10500亿元和10200亿元。2017年,无锡的GDP名义增速达14%,而长沙的GDP增速为9%,该市932个重大项目完成投资4200亿元。

现在,“万亿俱乐部”成员及其分布情况基本与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态势相一致。在12年前的2006年,上海率先达到“万亿”水平。据媒体统计,现有“万亿俱乐部”的14个成员,东部10个、中部两个、西部两个,而昔日财税大户东北则无一城市入列。若以城市群看,集中在上海、苏州、杭州、南京和无锡的长江三角洲“万亿俱乐部”成员最多,共有5个。珠江三角洲、京津冀、成渝和长江中游各有两个“万亿俱乐部”成员。若以省份而论,苏州、南京和无锡所在的江苏省“万亿俱乐部”成员最多,广东省虽然以两个城市在数量上位居第二,但广州和深圳都是“以一当二”;深圳和广州的GDP分别在2016年和2017年提升到了两万亿元。

进入“万亿俱乐部”的地方,其发展民生的动力和底气应该更足,居民的生活水平也应该更高。以上述“万亿俱乐部”成员的GDP水平,尤其是

超过了两万亿元的上海、北京、深圳和广州的GDP水平,已经达到了富可敌国的程度。即使以这几个地方的财政收入及可支配财政规模计,也达到了许多土地面积和人口规模都在其上的国家的水平。但是,如果向其中财政效率比较高的国家看齐,上海、北京、深圳和广州的民生水平还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

当然,GDP只是一个数值,其落实到地方财政以及地方可支配财政的盘子里,是国家的税收结构和事权划分的结果。但无论如何,“钱多”应该是办好事的前提条件。“万亿俱乐部”的成员,自然也应该在惠民民生方面为后来者做出示范。这个示范不仅在于如何发展,更在于如何将发展成果惠及民生。

不将GDP的提升与民生水平的提升相联系,即不将发展成果与民生相联系,这样的GDP纯粹就是一个数字而已,所谓“万亿俱乐部”也无非是一张政绩榜单。从另一个角度讲,只有把GDP与民生相联系,才能挤干GDP的水分,把万亿、千亿、百亿的政绩榜单弄干。如果声称GDP又增加了多少、增速多么喜人,民生却没有提升或者没有得到相应的提升,那么这样的GDP就很可疑,这样的政绩榜单就该挤挤水分。

民主生活会岂能有“怕”的心理

□ 谭用发

据一位县委书记透露,有上级领导要来县里督导县委常委民主生活会,因怕领导不满意,难以过关,会前班子成员花一天时间进行了“演练”。如今,类似这种有上级党政主要领导或组织督导的民主生活会,事先进行“演练”的并非个例。

因怕穿小鞋、怕伤和气、怕丢选票、怕失面子等,一些地方民主生活会的质量本来就不高,若再怕领导不满意,会前进行“演练”,问题恐怕会更多。

“怕”,是导致民主生活会走形变味的重要原因。邓小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还是东怕西怕,还是

怕讲心里话,我们党的老传统就恢复不起来。如何驱除“怕”的心理,提高民主生活会的质量和实效?“心病”还得“心药”医,有几种“心药”不妨一试。

一是“定心丸”。民主生活会不敢“真刀真枪”地开展批评,尤其是不敢真正地向主要领导提出批评意见,很大程度上是怕打击报复。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与战友定下“君子协议”,各自检讨,把话讲透,不准记仇,不影响工作。如今,要想批评真正“有辣味”,关键是要建立和完善批评者不受打击报复的制度保障机制,让批评者吃上“定心丸”。对搞打击报复的,要坚决依照有关规

定予以从重处分,以形成震慑力。要注重从班子建设入手,把民主作风好、善于听取批评意见作为考核和使用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重要依据。

二是“清心剂”。作为党员领导干部,更要清醒地看到,一个人有点过错不可怕,怕的是听不到一点批评的声音。陈毅说过:“一个人听不到批评,不能证明他是‘完人’,只能证明他‘完了’。”武汉科技大学原校长刘光临入狱后自问:“我一辈子都没有受过批评,怎么突然之间就进了监狱?”被判处死刑的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也曾发出感叹:“我多年没有听过批评的声音了,要是平时

能对我多批评几句,兴许今日不至于落得这般下场。”遗憾的是,这些人直到沦为阶下囚或走上断头台,才悟出批评的价值。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此教训应引为我们深刻的反思和警醒。

三是“养心汤”。养心安神是驱“怕”的重要心理疗法。要坚持以公为本,养无私心。当年,刘少奇在分析共产党人为什么能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时说:“因为他没有任何私心,所以他无所畏惧。他没有做过‘亏心事’,他的错误缺点能够自己公开。”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怕那怕,根子还是私心杂念在作祟。只有牢固树立公心,不计个人

得失,才能驱除“怕”的阴影。“病”由心生,也由心灭。“怕”字一除,民主生活会就会别开生面,“演练”等非正常现象就不会发生,批评的武器便能真正发挥“排毒祛邪”“醒脑治病”的作用。

光明论坛 中国新闻奖专栏

评论版投稿邮箱
gmpinglun@163.com

网络

民间图书馆 何陋之有

□ 邓海建

文化评析

一座“悦读之城”,一个“书香中国”,大概足以让新时代烙刻上更激越、更乐观的烙印。今年1月1日起,我国《公共图书馆法》正式开始施行,为日益庞大的公共图书馆事业提供了基本遵循。

如果说,政府投建是公共图书馆“自上而下”的生长方式,那么,民间设立则是公共图书馆更多元、更丰富的存在方式。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县级以上政府设立的公共图书馆达到3153

个,馆藏总量达9亿多册,年流通人数从2012年的4亿多增长到2016年的近7亿。有人担心,在地标性公共图书馆越来越像庞大的文化综合体的今天,在手机APP支撑的碎片化阅读的当下,民间图书馆还有存在的意义吗?这个问题,其实类似于公有制与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关系。财政投入的图书馆,体现的是公共责任,是职能作为;而民间建设的图书馆则是必要补充,是有益存在。

公共图书馆法总则明确提出:“国家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筹资金设立公共图书馆。”并且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积极

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建设,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政策扶持。”这些规定的背后,是制度安排对民间图书馆的认可。追根溯源下去,无非三个原因:第一,地标式图书馆固然高大上且辐射长远,但总有其“半径”所触及不到的地方。尤其在农村等基层,指望村民跋山涉水去县城看本书,总有点过于牵强。第二,民间图书馆灵便轻巧,根植基层、了然民情,更懂得民众阅读的“痛点”与刚需,在流动性不强的熟人社会,更有号召力与说服力。第三,各地财力悬殊,在精准扶贫是时代命题的当下,指望图书馆事业由公共财政一肩挑,显然

是“地方不能承受之重”。鼓励社会力量、整合社会资源,图书馆才能真正百花齐放。

当然,从历史上说,中国乡贤文化中的私人藏书楼,亦是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一环。比如安徽的安庆藏书楼、江苏无锡的大公图书馆等,繁盛如斯,裨益长远。即便是今天,比如山西省祁县昭余镇丰泽村村民权勇的文化大院,不仅收藏了两万多册书,还藏有1600部电影拷贝、3000余张电影海报。这些从历史纵深走来、向辽阔未来走去的民间图书馆,是浩荡华夏文化中的驿站,是图书馆文化史中的璀璨之光。

因地制宜的民间图书馆,在身边,在眼前,或在听春雨的小楼上,或在卖杏花的古巷间。它们也许并不显眼,甚至陋室几间,却有着文化的韧劲和张力,生生不息,源远流长。《公共图书馆法》不仅承认了它们的存在,更给其制度化保护,繁盛如斯,裨益长远。即便是今天,比如山西省祁县昭余镇丰泽村村民权勇的文化大院,不仅收藏了两万多册书,还藏有1600部电影拷贝、3000余张电影海报。这些从历史纵深走来、向辽阔未来走去的民间图书馆,是浩荡华夏文化中的驿站,是图书馆文化史中的璀璨之光。

叫停学生户外考试 别止于一则通知

□ 朱昌俊

日前,河南南阳官庄镇第一中心小学上百名学生寒风中跪在操场考试一事,被媒体曝光。该校校长回应称,因考试学生多,教室内坐不下。当地教育部门表示将通知各学校停止户外考试。

笔者特意查了下南阳最近的天气,最低温度0℃,最高也不过10℃左右,另外,空气质量为中度污染。如此环境下,即便是成年人在外面待久了都会感到明显不适,更何况是还要考试答题的小学生,而且是以跪着的方式。而对该校的孩子而言,冬天挨冻,或许还并不是最坏的状况。有该校学生反映:“夏天的时候晒得人眼睛都睁不开,还会中暑。”

冬挨冻,夏被晒。学校作出种种违反常识的举措,仅仅是因为“考试学生多,教室内坐不下”。这是理由吗?或许确实是,如果学校的硬件条件再“宽裕”一点,相信校方会尽可能避免这种状况的出现。但即便在现有条件下,要解决学生在室内考试“坐不下”的问题,目前的方式也显然并非唯一选择。比如,让各年级学生“错峰”考试,这种操作不涉及多少额外成本,也不难协调。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是校方想不到吗?恐怕更为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于,校方没有把孩子的“冷暖”或者说权益放在首位。

能够佐证上述结论的是,小学生寒风中考试,类似的新闻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甚至可以说,它成了季节性的重复问题。此前,有学校同样安排学生在寒冷的室外考试,理由是“防止作弊”;亦有学校学生只能通过绕圈跑步来取暖……从中不难看出,类似这样的现象与学校的硬件条件

或许确实是,如果学校的硬件条件再“宽裕”一点,相信校方会尽可能避免这种状况的出现。但即便在现有条件下,要解决学生在室内考试“坐不下”的问题,目前的方式也显然并非唯一选择。比如,让各年级学生“错峰”考试,这种操作不涉及多少额外成本,也不难协调。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是校方想不到吗?恐怕更为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于,校方没有把孩子的“冷暖”或者说权益放在首位。

能够佐证上述结论的是,小学生寒风中考试,类似的新闻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甚至可以说,它成了季节性的重复问题。此前,有学校同样安排学生在寒冷的室外考试,理由是“防止作弊”;亦有学校学生只能通过绕圈跑步来取暖……从中不难看出,类似这样的现象与学校的硬件条件

如何并无必然联系,更多还是校方乃至整个“社会系统”的态度。

由此现象衍生开来,其实不光是孩子的挨冻、被晒,幼儿园孩子遭遇虐待,校园欺凌现象高发等加之于孩子的伤害,某种程度上,都可以找到共同的因果链条。

就个案来看,事件在舆论介入后,当地教育部门回应称,将通知各学校停止户外考试。舆论的围观能够发挥作用,固然让人欣慰。只是,这种解决问题的路径依赖,似乎显得太奢侈了——不是每一个挨冻的孩子都能够被舆论关注到。无论如何,别让孩子冒着严寒跪着考试,不应该只能由“旁观者”指出后才能实现。我们的教育不能如此不知“冷暖”,对于孩子的权益呵护,我们的社会神经不能如此“迟钝”。

新闻随笔

2016年,《米其林指南上海2017》在上海发布。一个多世纪以来,《米其林指南》因其对餐厅星级评定的专业性,而成为人们在选择餐厅时的重要参考。不过,米其林较小的选择范围,对中国这样一个烹饪大国来说,也许并不全面。

1月16日,同样是在上海,2018大众点评“黑珍珠餐厅指南”正式发布。正像《舌尖上的中国》热播之后,中国烹饪文化由抽象而具象为中国人文化自信的代表之一,“黑珍珠餐厅指南”也同样是文化自信具象化努力的一部分。

一个地方的文化,有数不清的载体,其中饮食往往是最直接的载体之一。“民以食为天”,“人之初”的第一需要也是食物。但是,食物的不同烹饪方法及所使用的刀工、技艺、火候把握、用餐礼仪,乃至具有文化意味的器皿和就餐环境,都构成了饮食文化的丰富内涵。烹饪文化、饮食文化,是在人们的一日三餐中不断传承的。乡情也好,乡根也罢,如果没有弥漫其中的乡味,无疑就要索然寡淡得多。

文化,是抽象的,更是具体的。烹饪文化、饮食文化,因其“先入为主”的特点,是最先占据人们感觉器官和意识的那部分文化,也因此将文化的特色持续烙印进人们的感官、习惯和记忆,继而得以不断遗传。烹饪文化、饮食文化,就日常生活而言,是一种文化传承的重要符号。因此,《米其林指南》看似只是餐厅特色和质量的排行榜,而实际上也正是对文化特色的一种凸显和宣扬。

当然,就中国发达而丰厚的烹饪文化和饮食文化来说,扎根于本土的餐厅指南也许更能凸显中国烹饪文化和饮食文化所带来的文化自信,也是将中国烹饪文化和饮食文化进一步推向世界、扩大和巩固其影响的举措。

作为中国的餐厅排行榜,“黑珍珠餐厅指南”做出了这样的探索。近年来,“互联网+餐饮”的快速发展,不仅为人们选择就餐地点提供了方便,同时也为食客评价餐厅食品质量、特色以及价格提供了平台。这些评价,当然为“黑珍珠餐厅指南”的推出提供了基本数据和根据。但是,作为覆盖了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成都、重庆等22座国内城市以及东京、巴黎、纽约、

曼谷、新加坡5座海外城市的餐厅排行榜来说,仅凭食客的点评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菜系的烹饪大师、品味专家从专业角度提供重要意见。

可以相信,随着“黑珍珠餐厅指南”覆盖面的扩大,这颗体现中国烹饪文化和饮食文化的“黑珍珠”一定会闪耀于世界,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

土产

餐厅

能否

网言

部门单纯地“我说你听”,闭门制定规则后要求老百姓无条件接受,不是城市管理的应有做法。只有充分尊重百姓的习惯和权利,主动找到利益共同点,用服务代替管理,才是化解这类矛盾的“金钥匙”。熏肉等小事如此,其他大事亦然。

(原载于东方网 作者:罗志华 摘编:刘朝)

熏肉“神器”式管理值得点赞

每到岁末年初,重庆、四川、贵州等地的群众都有熏制腊肉、香肠等年货的风俗。原来,人们点燃松柏枝后用烟熏制腊味,因为污染较为严重,地方政府曾出台禁令。如今,一些地方研制出了熏肉“神器”,由“神器”熏出来的腊肉既保证了原来的味道,又环保,社区居民无不为此点赞。

地方有环保和城市管理压力,市民有熏制年味的传统风俗,在这种矛盾之下,地方执法部门很容易受到选择性执法的质疑。站在百姓的角度思考,以服务优先、管理兜底的态度工作,才能最终化解矛盾,熏肉“神器”就是这么应运而生的。熏肉虽是小事,但化解了城市管理中的矛盾,其中蕴含着大道理。相关